

# 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研究

## ——基于Y村龙舟的个案考察

倪军,杨淑梅,涂传飞,吴丽芳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既有助于其探寻传承路径,也可助益于党建的创新发展。运用个案研究、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旨在探究Y村龙舟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二者融合遵循认同、吸纳与产生的递进机制:通过功能认同和符号认同,二者的文化边界得以消解;资源吸纳推动了二者的深度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姿态;在治理合法性和传承可靠性的生产中,互融姿态得以长效维持。民俗体育文化与党建互融是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有助于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运作机制促进基层党建的创新,基层党组织可以利用存量的民俗体育资源实现乡村简约化治理。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基层党建;互融实践机制;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67;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4-0079-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901.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部署<sup>[1]</sup>,并倡导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出文化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相衔接并创造性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或创新载体,既是其有效传继亟需思考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Y村将地方性的龙舟文化融入村内党建发展中,成为市里为数不多的党建“三化建设”试点之一,同时这种创新性的互融发展措施也推动了村落建设。党和国家提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十分重视“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sup>[1]</sup>。Y村案例对于思考如何推动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融合创新发展,进而破解基层社会中的干群分离、党建形式化等问题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然而,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机制为何?与基层党建融合能否为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一种传承路径?在乡村场域中发生的融合实践能否启示乡村治理呢?

研究将上述疑问定位于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题域中,并进行相关文献梳理。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遵循两种研究进路:①本体适应能力型,这一进路主张改造文化本身以适应时代发展,如强化社会功能<sup>[2-3]</sup>和意义<sup>[4]</sup>等;②外部力量融入型,这一进路则强调引入外部力量来推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如融入国家力量的非遗保护、融入市场力量民俗体育旅游<sup>[5]</sup>和依托教育集中力量的进校园策略<sup>[6-7]</sup>等。目前,融入外部力量型的发展进路深受学者重视。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融合发展,并提出民俗体育文化可以促进大众对党的认同<sup>[8]</sup>,作为基层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宝贵资源<sup>[9]</sup>等观点;也发出了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逐渐式微的境况下应发挥党组织核心治理主体角色的呼吁<sup>[10]</sup>,发挥党在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中的扶持引领作用<sup>[11]</sup>的呼吁。总体而言,融入外部力量型党

收稿日期:2023-0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TY008)。

第一作者:倪军(1995—),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农村体育、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信作者:涂传飞(1976—),男,江西南昌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融合发展进路,已有深厚的认识论基础,但也存在可拓展的空间:①就研究范式而言,民俗体育文化与党建融合发展以价值判断性的观点和宏大理论推理为主,总体上处于应然的话语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经验中的学理挖掘;②就研究视角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单向度视角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单向度视角不利于揭示两者互融互构内在机理。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并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研究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从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sup>[12]</sup>。Y村案例对传承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均有理论借鉴价值,且可以推动传统体育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并丰富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内容<sup>[13]</sup>。由此,本文基于Y村案例进行考察,拟从理论上归纳民俗体育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并对民俗体育文化传承路径、基层党建发展及乡村治理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以江西省南昌县Y村龙舟文化与基层党建的互融实践机制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①个案研究法。Y村龙舟文化由以往的宗族活动延续至今,历史悠久、仪式丰富,群众基础深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到五月初五期间,Y村与Q村、M村、S村和R村等5个兄弟村落自古就有轮流举办“联村龙舟赛”的习俗,五村巡游、五村竞渡。村民们则烧香请愿、祭拜“龙神”,与兄弟村落的亲朋共享龙舟宴、观龙舟、赛龙舟。其中,在Y村举办的传统龙舟赛近年来被地方政府征用,并在2014年改为由政府主办,自此Y村龙舟赛由群众自发性组织进入国家化实践阶段。后来,Y村龙舟队开始代表县、省乃至国家参赛,并多次在省级、国家级以及国际级赛事中夺得冠军,影响力和知名度迅速提升,并成为Y村一大特色。龙舟在发展过程中与Y村党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成为重要板块,因此,本研究以发生在Y村中的龙舟文化与党建的融合实践为案例展开相关研究。②参与观察法。课题组在2017—2022年中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观看龙舟赛,参观龙舟文化与党建融合发展的成果,搜集了大量的视

频、图片和访谈资料。③深度访谈法。在2017—2022年期间就龙舟文化与基层党建相关议题多次访谈南昌县政府、县委宣传部、南昌县教育体育局、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湖管理处、南昌县龙舟协会以及Y村村委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并随机访谈了Y村村民。

## 2 认同机制:消解文化边界,达成融合共识

龙舟文化与党建文化客观上属于两种异质的文化类型,存在“我”与“他”的边界。边界的消解是互融的前提,需要以彼此认同的造就为基本策略,来促成“我”与“他”理念认知上的簇拥之态。

### 2.1 党建主体对龙舟文化的功能性认同

龙舟作为我国地方社会中生动的仪式性文化景观,具有丰富的地方意义,也凝聚着广泛的象征价值。龙舟文化在Y村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沉淀为一种心智结构,外在地表现为共同的生活习性或者运动爱好,内在的驾驭着集体文化规训下的共同意识。正如涂尔干所言:“拥有同样的习俗和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群体,即有相似性而构成的共同意识和一致性。”<sup>[14]</sup>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仪式文化在村落共同体建构方面仍具有其合理性,文化共识仍旧可以被应用于村民们一致性行动的协调中,发挥整合性的实用功能。

“如果在我们这里搞一个篮球赛、足球赛可能不怎么会有人看,但你要是搞个龙舟赛那肯定是人山人海!”(YGQ20210517)

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农村社会发展的核心主体,党建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宗旨和目标的主要途径,其核心功能就是要创新领导方式以更好地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和有序整合,构筑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sup>[15]</sup>。作为发轫于地方社会中的龙舟文化,其本身具有扎根乡土、亲近民众的特征,背后所汇聚的动员力、号召力俨然触及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曼纽尔·卡斯特将认同的来源划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等3种形式,其中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sup>[16]</sup>。龙舟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中有着积极正向的文化地位与功能,与龙舟文化的紧密结合便于提升党建文化在地化的适应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刚性支配的色彩,更有利

于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发挥联系、组织和管理群众的作用。承载着积极意涵的龙舟文化与先进文化代表的党组织具有意义上的趋同性。作为浓缩了诸多象征意涵的龙舟文化,除了具有特殊的地方意义,也与更大意义上的精神阐释相联系。在龙舟文化中,队员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等表现现实性地陈述了集体主义、奋斗精神等社会主流价值观,这种功能是党组织在社会引领过程中所需要的。

“当时(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家要求加强党建工作,我们村正好有龙舟,而且你看它的影响力也不小,上面也非常关注我们Y村龙舟,我们有这个优势。”(YGQ20190512)

仪式文化历来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国家亦使用象征的、仪式的内容与形式来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系统。”<sup>[17]</sup>不难发现,龙舟文化不论是在地方中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中都与党组织的治理效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不仅合乎党建文化组织整合基层社会的实践要旨,也将主流价值观转译为具体现象,将民族性的精神文化力量与党的理念结合,帮助党组织应对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难题,并获得认可。

## 2.2 龙舟文化持有者对党建文化的符号认同

认同是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目的象征性认可<sup>[16]</sup>。异质性文化边界的消解一定程度上可以诉诸文化主体的认可,党建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同关涉前者背后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决策。融合是相互的,龙舟文化的持有者对党建文化的支持与认可至关重要,他们分别是连接党建文化与龙舟文化的党组织以及村民。在实践中Y村党组织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Y村的村干部们每年端午节前夕要和其他4个村的村干部商量本年度龙舟赛策划筹备事宜,也要和群众志愿者积极筹备龙舟赛的各项事宜,做好接待工作,以保障赛事的有序开展。村书记YGQ更是为了龙舟队参赛而到处“化缘”,寻找赞助商,筹集比赛和训练经费,访谈中也多次表示推动龙舟文化与党建文化融合是“非常应该的”,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是龙舟文化是“老百姓喜欢的”。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头雁”作用提升了其在村落内部的声望,获得了一种村民承认的力量,为动员村民积累了深厚的信任基础,也为龙舟文化与党建融合发展塑造了友好环境。

“大家把这个东西搞得像模像样,达到这么高的层面,领头人有很大的作用!YGQ书记在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发挥了相当大的党员模范作用……这个领头人很重要,领头人要有这个决心。”(YWQ20210503)

村民是村落文化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力量,龙舟文化与党建融合不能忽视村民的态度,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好事儿”。税费改革之后,国家与村庄社会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村庄社会表现出一种增量逻辑,即在不改变存量资源基础上,尽量争取国家项目以实现自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能得一点是一点”底线满足原则<sup>[18]</sup>。与党建融合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年来村委会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也为龙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切实效果,如龙舟河道的清淤工作,村民们认识到作为正式力量的党和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融合代表着龙舟文化与一种更高级别符号建立了牢固的正式关系,使二者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有利于达成确立自我身份的目的<sup>[19]</sup>。党的符号的融入丰富了Y村龙舟的外化形象,村民们积极地配合党组织发展龙舟文化,并利用自媒体宣传,既体现了村民们认同的心理,也反映出党建的文化力量对个体的涵化。

“除了村干部外还有很多村民主动担任志愿者,负责龙舟赛的安保工作和秩序维护工作……在开幕式中积极演出,活跃气氛,竞赛期间大家会拍照发朋友圈,并配上激情振奋的话……在龙舟队训练的时候,主要负责一些保障工作。”(LXJ20210517)

总体而言,龙舟文化与党建融合不仅落实了国家层面的呼吁,也得到了村干部与村民广泛参与和支持,为二者顺利、深入地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要素条件,创设了融合发展的良好环境。如果仅有意义层面的趋同而没有文化主体的认同,那么龙舟文化与党建融合的成效必然会大大削弱。党建也无法借助龙舟文化有效联系、引领群众,反而会陷入“党组织干、群众看”的无序化、形式化发展困境<sup>[20]</sup>。基层党建对于龙舟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功能合法性认同,党组织以此缩短党群距离,发挥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多重功能,彰显“有效在场”的社会意义。龙舟文化对于党建文化可理解为一种国家符号的认同,文化主体在政治教育和价值引导下



对党和政府高度认同,并愿意在其引导和动员下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村落事务,并从中获得成就感<sup>[21]</sup>。总之,党建文化与龙舟文化的双向认同机制消解了二者的边界,产生了在共识基础上的互渗、互叠、互筑,奠定了实质性文化融合的前提。

### 3 吸纳机制:激活融合动力,互塑发展资源

认同机制加深了龙舟文化与党建文化之间的联系,在一般场域中达到互相吸引的共存状态,但这种状态是表层的、停滞的。认同并不意味着要融合,还要借助一定的动力推动二者往更深入的状态发展。

#### 3.1 党建吸纳龙舟文化的资源化要素

亨廷顿指出:“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sup>[22]</sup>吸纳机制为党建文化与龙舟文化互融实践的深层演化注入了动力。前者对后者的吸纳表现为党在基层组织建设和功能调整中,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吸收与整合,依靠社会性力量反哺自身建设,扩大执政基础,扩充可用的服务资源<sup>[23]</sup>。将龙舟元素融入党建文化设计并将其物化为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吸纳机制在Y村最直接具体的呈现。物化是指将精神层面的非实物或稀有物,转化为能够广泛传播的有形物形成体育文化物品,从而发挥文化的传承、激励和熏陶作用<sup>[24]</sup>。具体表现在:①将党建文化宣传栏、党建文化墙乃至村里路灯灯箱上都印有龙身造型、中国共产党党徽、廉政文化等元素;②在村口建造队员们迎着激流协同奋力划龙舟的大型石雕,龙舟船体上写有“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等金句;③Y村龙舟赛河道岸边建造了党建文化走廊,在走廊北侧摆放一座红色龙舟雕像,南侧的党建文化宣传栏下方则摆放了两条退役龙舟,南北两侧的雕像中都写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具体内容。走廊中还穿插着醒目的“龙舟文化展Y村新貌、乡村德治树文明乡风”标语,及近年来Y村龙舟取得重要荣誉的展板。

将龙舟队作为党组织人力资源拓展的核心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障党员群体先进性,加强党组织对社会各群体的包容性,党的政策尤为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与流动人口中发展党员以提升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阶层的“政治底色”<sup>[25]</sup>。Y村在成立村党总支时也在第一党支部下面成立了文体

党小组,办公地点则设在了村龙舟协会中。这一举措搭建了党组织与龙舟队之间的交流平台,加深了双方互动沟通,也为党组织建设注入了特色,Y村党总支也因此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另外,这种便利无形中也为党组织建设了选拔优秀人员的窗口。据统计,截至2021年Y村通过龙舟发展的党员有8名,入党积极分子有20余名,通过龙舟文化建设培养和选拔先进分子成为党组织的主要思路,实现了党员与群众的身份统合。

“党员主要是从龙舟队里面发展,然后是从其他文体活动里面发展。”(YWQ20210503)

村落中的存量文化资源紧密地贴合村民日常生活,自古以来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治理属性,Y村党组织将龙舟文化吸纳进党建文化并转化为结构性资源,是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的组织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sup>[26]</sup>。党组织吸纳龙舟文化不仅可以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夯实党组织建设,提升服务能力,淬炼精神风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与发展。

#### 3.2 龙舟文化对党建的资源化依附

民俗体育是地方村民创造的文化成果,大部分时间处于自发状态,与党建的关系较为疏远。Y村龙舟文化被党建文化吸纳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反向吸纳,吸收着党建文化中的资源并为我所用。Y村历来有将龙舟比赛取得的荣誉、奖杯和奖牌陈列在村里的党员活动室中的传统,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主题教育的主要载体。后来,在政府和村党组织的支持下,Y村依托“三化建设”首创性地开设以龙舟文化为题材的龙舟文化展厅,收纳龙舟竞赛的荣誉奖杯、比赛的队服队旗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龙舟设施等。此外,Y村还在赛龙舟河道边的显著位置建造殷洪乔纪念碑,龙舟习俗作为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献祭给殷氏祖先的重要仪式活动。殷氏的祖先殷洪乔为官清正廉明,当地流传着歌颂其廉洁品质的“洪乔投书”典故,这一举措创新性地将龙舟文化与党的廉政教育结合在一起,意在教化党员廉政为民。如此“博物馆式”的村落空间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意义,既在当下发挥着“这个场所聚集了何种记忆”的展示功能,也遵循着将历史

性事实转化为可纪念的文本性事实的文化记忆逻辑,这些空间景观的文化维度在前后、上下的继替中得以拓展<sup>[27]</sup>。

在基层社会中,“亮点”具有不断扩大、不断吸纳资源的效应<sup>[28]</sup>。除了龙舟文化展厅的建设以及宗族文化的发扬,党建文化吸纳龙舟文化的同时,也为后者的日常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资源。

“文体党小组开展的活动中除了广场舞等以外,以龙舟赛最具特色,每年文体党小组开展的文体活动中,约50%的活动经费用于组织开展龙舟活动,参与龙舟活动的党员在文体党小组中占比高达50%。”(LXJ20210503)

有了资金的支持,龙舟活动朝着更高质量发展。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社会可以通过对国家仪式符号的征用而出现在国家中,从而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征用<sup>[29]</sup>。因此,与党建文化的融合一定意义上可视为龙舟文化对国家符号的征用。符号作为一种意义系统也会体现出等级差异:“对这种差异的符号等级制度的接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对于符号的规范、符号的价值以及符号的社会强制性等的内化,都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决定性的社会控制形式。”<sup>[30]</sup>国家符号或者与之紧密相关的符号无疑处于最高的符号等级,在个体的价值观念中处于极高的权威地位,国家符号也因此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吸纳能力。因而,与国家符号的融合可以赋予Y村龙舟在基层社会中广泛的资源吸纳能力,除了吸纳政府资金、信息和技术等资源,也可以是一些优先发展的机会如参加高水平比赛等。可见,龙舟文化吸纳党建及其背后的资源,延展了自身的发展维度,促进了自身的立体化发展,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吸纳机制能够在互相资源化过程中生发动力,不断加深互融程度。

#### 4 生产机制:强化治理的合法性,蒂固传继的可靠性

融合理应是一种稳定状态的追求,而不是简单、短暂的接触。维持民俗体育与党建的融合需要将资源元素改造、转化,生产出单一主体在发展中难以产生的效益,在价值互惠中维持向心黏合之态。认同机制与吸纳机制属于前置条件,最终是为了激活生产机制,使有限空间中的资源利用最大化,生产出利

于双方发展的有效势能。

##### 4.1 基层党组织治理合法性的生产

在乡村发展中,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主体需要通过治理能力的生产与输出来达到党建引领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实现多元共治的目标<sup>[31]</sup>。村民是村落发展的主体力量,党组织以村民们普遍认同的龙舟文化为连接平台,将党建发展、文化传承、村落建设、村民幸福感紧密结合,以激发自觉意识和主动行动来生产村民主体性,完成集体事务。基层治理必须借解决问题来形成一般化的解决问题的治理能力,让村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国家投入再多资源也不可能为村民建设出美好生活<sup>[32]</sup>。Y村将龙舟文化与基层党建融合发展,以扎根于村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活动为媒介,有效凝聚村民集体行动合力,有效地转化成了村民对家乡建设的浓厚热情。“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sup>[33]</sup>,乡村建设与党建发展亦是如此。Y村将村集体收入部分用于推动龙舟与党建的联合发展,不仅响应了国家党建发展号召,也强化了村民对村内主流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获得感,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在这些力量的驱动下,村民自觉自愿地与党组织配合完成接待外村观众和运动员,担任龙舟赛事的安保志愿者,为龙舟赛进行军鼓、广场舞表演等事项,也进一步成为一种村落建设主体性生产的方式。

文化融合促进党组织与村民走向了共建共享龙舟文化的公共领域,实现了村落公共性的生产。村落治理共同体的活动开展以村内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能够嵌入公共性,个体方有可能超越个体私利倾向,被村庄治理共同体广泛地组织起来,不断拓展利益联结的公共空间<sup>[34]</sup>。党组织对村落标志性的民俗进行公益布景,在村落公共场域中描摹出一幅美好生活的愿景,在价值、利益和责任等共识的驱动下,村民体悟到自身行为与村庄美好生活建设的紧密关联,自觉与党组织合作配合,为村落活动贡献志愿行为。在互融实践中,村民与党组织合作有平台、交流有途径、精神有寄托,不断释放空间内的公共性,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亲近化,在互助合作中巩固着村落共同体的韧性,孕育着村落的公共精神。龙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鼓舞强化了党员的素质,在文化互融实践中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党组织的堡垒角色彰显。龙舟文化中蕴含的奋发向上、同舟共济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这与从龙舟队伍中吸纳的先进分子密切相关,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空间内,这些精英是威望与关注度的代表,他们被吸纳及其被党支部再组织化能够发挥党组织的动员成效。南昌县教体局副局长DHY曾积极评价道:“常年被龙舟精神洗礼的Y村村干部和村民的精气神就是和其他村的不一样。”

“在龙舟文化的带领下,我们Y村村民精神更团结,邻里和谐、精气神都不一样的,这样的精神我们做什么事业都是做一场就成了,干一场成一场,不管是上面要求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居家养老……我把它称为我们Y村精神。”(YGQ20210503)

公共性和主体性的生产是基层党组织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低效的秘籍,发挥着调和公私矛盾和激活村民乡村建设核心作用的功能,也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 4.2 龙舟文化传承可靠性的生产

传承主体的主动性是维系民俗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就Y村案例而言,Y村党组织进行主体性与公共性生产也完成了对传承主体的价值塑造,激发出文化传承的热情与主动性,提升了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可靠性。民俗体育并不是经济发展和完成行政任务的抓手和载体,其可持续性发展是建立在农民的主体地位上,也即是否满足了其内生性需求,他们的主体权力、能力是否得到发挥和实施,是否是民俗体育成果的获得者和共享者<sup>[35]</sup>。如若传承主体的主动性缺失,资金、政策等支持性资源往往难以发挥出文化传继的应有效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也难免落入虚化、弱化、衰化的困境。相比于提供支持性资源,传承主体的培养是第一性的,是相对可靠的,也是龙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没有民众的参与热情,民俗体育文化是难以旺盛的,流淌在其文化肌体中的血液是难以沸腾的。党建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为Y村龙舟文化建设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条件加持,被物化的龙舟文化遍布村落各处,塑造出欣欣向荣的村貌民风。这种方式促进了文化的去时空化,村民们可以在除端午节庆期间的其他时间段感受、体悟家乡文化,尤其是激励、教化年轻一代,如南昌县龙舟协会秘书长YWQ所言:“这(村落

的龙舟文化建设)有利于传承,尤其是熏陶年轻一代。”龙舟文化在公共领域中“低头不见抬头见”式的深度展演与村民们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潜移默化地培育着村民的文化意识,尤其是青年群体。

承载着国家符号的党建促进了Y村龙舟往更加文明规范的方向发展。“在现代政治系统的权力关系建设情境下,政治符号动员个体进行与他人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sup>[36]</sup>在党建的加持下对龙舟赛的举行起到了一定的规训作用,大部分村民和队员能将当代社会的文明价值观内化于心,在举办龙舟活动期间自发形成和谐融洽团结的气氛,以往的吵架、冲突甚至械斗事件渐渐消失。这种“止戈”的效应也如涟漪般周边地区扩散,国家符号成为化解活动矛盾的助手,促进了Y村龙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周边包括南昌县这个龙舟都是我们带起来的,愿意跟我们玩,我就会邀请他们来玩。现在比不得以前了,以前划龙舟的时候经常会吵架、打架,现在不会了!现在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就像我们习近平主席讲的嘛,要懂法要文明,这些让老百姓玩得和谐了、玩得团结了。”(YGQ20210503)

生产机制的激活是维系党建文化与龙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之态的最终旨归,它蛰伏着互惠前提下的资源向目标转化的逻辑,通俗意义上讲便是“既要开花,又要结果”。龙舟文化与民俗文化通过融合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的有机体,其中暗含了对这一实践模式实用性的考量,只有不断将资源化过程转化为符合社会发展和民众期望的结果,互融实践才是完整的、深刻的。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本文以Y村龙舟文化与党建互融为例揭示了互融所蕴含的认同、吸纳和生产机制,及这三者之间呈现的递进关系。该案例反映了民俗体育文化与党建深入发展的过程,两种异质性在文化功能认同与符号认同中消解了边界,奠定互相融合的前提;党建吸纳龙舟文化所需的要素,龙舟文化则依附于党建所带来的诸多发展机会,相互资源化为二者融合提供了深入融合的动力;生产机制维持了融合基本态势,将资源转化为实用性的成果,也就是治理合法性

与传承可靠性,这种成果一定程度上是孤立发展难以产出的成效。另外,每一项机制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既可以影响另一方,又可以受另一方影响。但受文化层级的影响,基层党建在与民俗体育文化互融过程中依旧发挥着主导性地位,影响着资金、政策等支持性资源的流动方向,监督、规训龙舟文化的发展方向。

## 5.2 讨论

第一,与党建互融是民俗体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党建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基于实践的人民需求。“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学说和科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sup>[37]</sup>从宗族附属到党建互融,民俗体育文化走出庄严殿堂并转化为一种民间体育活动方式,从神圣向世俗的转变是一种适应性的调整,既反映出民俗体育生活化的现代取向,也是获取发展动力的现代化探索。在不改变民俗体育文化基本运行逻辑的前提下,与党建融合落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人类美好生活目标,带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享体育事业成果,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治理理念<sup>[38]</sup>。党建与民俗体育文化互融的基础除了功能、符号等现实取向之外,还包含党员与人民身份的统一合并,从龙舟队伍中发展党员进而引领龙舟文化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俗体育与党建融合遵循着文化传承与有机改造相统一的历史规律,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满足大众之需,契合社会发展之潮,既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也是民俗体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

第二,民俗体育文化可以促进基层党建创新。党建创新是推动乡村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下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有益模式,如江西赣州分宜县互动型创新模式,枫桥村“互联网+党建”的创新模式,都江堰市“党引民治”的党建统合创新模式等。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丰富,以民俗体育文化为抓手创新党建模式,具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便捷性,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成本。基层党建并不能停留在一味地灌输官方的思想,这样反而不利于群众接受<sup>[39]</sup>。党员与群众的身份统合投射于党建与民俗

体育文化融合的现实景观中,这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使党的信念、政策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切实发挥引领乡村发展的作用。民俗体育文化根植于村民的组织体系,其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与精神能够赋予党建亲和力、组织力,增强村民对基层党组织认同感,帮助其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运作机制,创新出与乡村社会相匹适的党建运作模式。

第三,民俗体育文化与党建融合作为认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窗口。乡村治理现代化实际上是变迁社会的治理逻辑回应,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都存在权力下沉和基层政府科层化的特征,但我国乡村社会遵循的是简约治理逻辑而非西方的科层治理模式。黄宗智<sup>[40]</sup>基于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先提出了简约治理的概念,欧阳静<sup>[41]</sup>立足于现代乡村社会提出了新简约治理的概念。新简约治理保留了传统的“简约”特征,即不论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现代乡村社会都可以不依托繁密的科层机构、专业的人力资源以及庞大的资金配置,利用低成本的乡规民约、道德伦理等资源等简约方式高效率地完成国家政策目标,实现有序治理。但新旧简约治理的区别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县官”鲜少在场的自我管理状态,呈现“无为而治”状态,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任,简约治理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出以党组织为基础的“积极有为”时代特征<sup>[41]</sup>。民俗体育文化与党建融合缩影式地反映了党组织利用本地化资源获取民心,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简约化乡村治理模式。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党建的政治引领机制,引导治理主体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立场<sup>[42]</sup>。因此,党组织以民俗体育文化项目为抓手进行乡村治理虽简约,但又是一种尊重地方差异、适合国情、为民众服务的积极有为的治理方式,如此也启发我们应当守住民俗(体育)文化这一乡村治理底线。

##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2-10-17(2).
- [2] 涂传飞.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变迁[J].体育科学,2010,30(7):81-96.
- [3] 孟林盛,乔恩东,李慧贤,等.村落民俗体育的文化生态适



- 应与当代发展——基于下董寨村“跑马排”春节习俗的田野调查[J].体育与科学,2021,42(3):26-34.
- [4] 吴应广,李士英.乡村生活空间下民俗体育意义化的生成逻辑——基于一个地域村落的考察[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6):123-130.
- [5] 向军,张智.“礼物”与“商品”兼容: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二重性特征——基于湖南麻阳民间龙舟赛的田野考察[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4):121-133.
- [6] 崔涛,张波,周坤,等.传承传统文化视野下校园民俗体育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9,199(1):94-99.
- [7] 朱罗敬,汤立许,肖丽,等.校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再优化研究——基于临江市两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传承实践比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5):600-607.
- [8] 白晋湘.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J].体育学研究,2019,2(1):1-6.
- [9] 文丰安.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3):1-11.
- [10] 彭春兰,龙佩林,白晋湘,等.新时代我国民俗体育治理体系构建及地方性策略选择[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0):20-26,55.
- [11] 涂传飞.近10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述评[J].体育科学,2019,39(8):50-60.
- [12]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21-22.
- [13] 杨桦,任海.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构建[J].体育科学,2022,42(8):3-20.
- [14]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15] 黄立丰.建构文化认同:“嵌入式”党建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浙江宁波F新型农村社区的探索思考[J].理论月刊,2019,(10):153-160.
- [16]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 [17] 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J].读书,1999(9):125-131.
- [18] 李祖佩.“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J].社会,2016,36(3):167-191.
- [19]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 [20] 吴高辉,汪文新.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构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2):66-75,126.
- [21] 唐有财,胡兵.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国家认同与社区认同的双重驱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2):63-69.
- [22]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23] 蒋源.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J].社会主义研究,2016,229(5):107-115.
- [24] 王道杰.体育物化文化研究引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6):13-19,28.
- [25] 孟天广,王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叙事”:转型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6):1-12.
-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7] 畅洁卓玛,王智慧.异质化的身体与空间: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与表达趋向[J].体育与科学,2023,44(4):7-14.
- [28]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206(2):64-79,205.
- [29] 杨海晨,吴林隐,王斌.走向相互在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J].体育与科学,2017,38(3):84-93.
- [30]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1] 何得桂,王怡涵.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25(1):22-31.
- [32] 贺雪峰.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1):166-174.
-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4] 王飞,孙建国.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J].湖北社会科学,2023(6):47-56.
- [35] 李伟艳,郑国华,郎勇春.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落体育主体性探研——以鲁西孔村为例[J].体育学研究,2022,36(1):24-32.
- [36] 薛洁.国家建设:符号系统政治功能的转向[J].浙江社会科学,2020(7):21-29,38,156-157.
- [37] 陈其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逻辑[N].人民日报,2022-03-21(10).
- [38] 朱传耿,郭修金,王凯,等.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1):1-14.
- [39] 周永伟,李彦霖.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宁夏社会科学,2023,238(2):66-73.
- [40]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194(2):10-29.
- [41] 欧阳静.简约治理: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2,315(3):145-163,207.
- [42] 黄晓春.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21(6):116-135,206-207.

#### 作者贡献声明:

倪军:实地调查,查阅资料,选定主题,撰写论文;  
杨淑梅:实地调查,查阅资料,矫正稿件;涂传飞:实地调查,确定主题,设计并论证论文框架,矫正稿件;吴丽芳:论证文章框架,矫正稿件。

(下转第99页)



##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Sports

——Fieldwork based on 6 Urban Communities

LI Xiaodong<sup>1,2</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2.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0,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a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ogether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the physical point of view, residents not only hope to improve their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effective sports participation, but also hope to improve their social health. From the emotional perspective, the value retur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in community sports participation provide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companionship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driving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ith group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ursuit of sports stimulation also satisfies the participants' personal emotional needs. From the spatial level,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has strengthened the physical space condi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community sports activities has also expanded the organizational space.

**Key words:** physical health, emotional experience, space reconstruction, embodied experience;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sports

---

(上接第87页)

##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Dragon Boat in Y Village

NI Jun, YANG Shumei, TU Chuanfei, WU Lif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not only help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Using case studi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dragon boat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in Y Vill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follows the progressive mechanism of identification, absorption, and production: through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ymbolic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boundaries of the two are dissolved; the absorption of resources promot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resenting a posture of a unified wh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governance legitimacy and inheritance reliability, the integration posture is effectively maintained for a long term.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arty building is a modernized development path in China, which helps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closely contacting the masse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and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make use of the stock of folk sports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simplifi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folk sports culture;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mutual integration practice mechanism; rur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